

(<http://ceas.yale.edu/events/freedom-and-fear-hong-kong-media-xiang-gang-mei-ti-zi-you-he-qu-he-cong>)

二零一四年四月廿四日，康正果老師在耶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香港媒體自由何去何從？》座談會上的發言：

港人的自由與中共對它的利用和侵蝕

談到香港這個城市，我首先聯想到兩種人物：多重間諜和公共情婦。前者向不同的老闆出賣情報，後者給不同的恩主提供愛情。

我為何要如此比擬香港這個城市？衆所周知，這塊土地早在 1842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就割讓給英國。對老舊的中國來說，這是個恥辱。但就這塊土地本身而言，它卻獲得了被放棄和出賣後的自由。

從此以後，英國人在那裏建立起公司、銀行、教會、報社、法院、警察局等一大批舊中國沒有的機構，形成了這塊土地上特有的社會文化生態。在這一中西雜處的城市群落中，中國傳統的民間社會逐漸與西方的「公民社會」有機地攪拌在一起。

回歸前的香港人並非真正的英國公民，回歸後的香港人也算不上標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香港人曾被殖民的身份反讓他們獲得了對一黨專政的豁免，而曾受大英帝國強暴的經歷也補償給他們足以使自己區別於內地人的身價。

香港人缺乏「國家認同」的這一畸形境況使他們的社會和地盤特別具有吸附力和包容性。那是一個既藏垢納污，也臥虎藏龍的地方。三教九流，在那裏各得其所，左右中間各派，在其中都有足夠的空間發言爭鳴。比如有親共的《大公報》、《文匯報》，偏右的《蘋

果日報》，以及持中立立場的其他報紙，其中尤以《明報》為知名。《明報》除了在大躍進、文革、鄧小平重出政壇和 1989 六四事件期間在中國擁有最好的記者網絡，還利用《明報月刊》和出版社為知識份子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平臺，我那本回憶錄《我的反動自述》即該出版社出版。

我們現在在此談論香港的媒體自由，首先應該看到這個自由賴以建立的基礎，那就是英國人曾經建立的制度和留下的遺產，如司法獨立，港人治港，自由貿易，特別是香港人真正擁有言論、出版以及遊行集會等自由的權利。

由於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缺乏「國家認同」的中性特徵，這諸多自由從一開始就潛在著被利用和濫用的危機。它不只被跨國公司、投機商人、文化掮客以及黑社會所利用，也一直為共產黨所充分利用。

對共產黨來說，在不同的時期，香港的吸附力和包容性及其諸多自由有著很不相同的意義。在 1949 以前，香港是中共逃犯的避難所，地下黨潛伏的基地，是為支持中共的武裝鬥爭而募集款項和偷運武器等物資的中轉站。

最近爆出醜聞的華潤公司，就是中共地下黨 1949 前在香港搞起來的。總的來說，中共在武力奪取政權的整個過程中，都極大地利用了香港這個貿易和傳媒均相對自由的陣地，搞了很多只有在那裏才有可能搞下去的顛覆活動，而且很早就埋伏下紅色勢力的黨羽，種下了侵蝕港人自由的禍根。

1949 的「解放」到 1997 又是一個特殊的階段。與其說中共在奪權後沒能力收回這塊割讓的土地，不如說中共暫時還不想收回。對中

共來說，鞏固和擴張他們的黨權向來都比維護國家的主權重要得多。

特別是在冷戰時期，保存住香港這個通往自由世界的跳板，最便於中共的勢力滲透到臺灣和西方，去勾結可收買到的各種勢力。爲了謀取多方面的利益，中共寧可把這塊領土暫時抵押在港英當局手中。

比如，地處跑馬地投注大堂旁邊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好多年來都在新聞自由的掩護下建立起中共反西方、反臺灣的前哨陣地，使香港成爲中共向海外進行宣傳的最佳窗口。

香港傳媒的境遇在 1949 前與 1949 後的不同之處在於，49 後的中共不但利用香港的傳媒自由對香港實施「摻沙子」和「挖牆腳」的活動，而且開始使用他們已經建立的專政機器殘害香港媒體的從業人員。早在 50 年代初，就有六名香港報業的編輯和記者在廣州被捕，隨即以所謂「文化特務」的罪名遭到槍殺。

從 49 後到 97 前，中共對港人自由的威脅主要是煽動港人的愛國情緒，製造反西方、反民主社會價值的動亂。利用勞工階層的不滿，推銷中共的意識形態。文革期間，紅色風暴也一度掃蕩香港，紅衛兵曾囂張到要解放香港的地步。有一位商業電臺節目主持人名叫林彬，就因批評極左土共的暴行，在上班途中被土共的黑惡暴徒縱火燒死。當時《明報》的總編輯查良鏞在暗殺名單上便名列第二，因爲他寫社論批評了北京當局。

左派與右派的鬥爭從此加劇，港人與港英當局的鬥爭受到中共勢力的滲透和偏導，這一切都給中共勢力的寄生和侵蝕造成了渾水摸魚的便利。

如果說 97 前港人的「愛港愛國」還迴旋著親和大陸的情調，那麼在 97 之後，「愛港」與「愛國」便出現了分裂。

從前對祖國的親和來自對港英當局的拒斥，回歸之後，港人卻感到他們的自由和福利日益受到中共黨國的威脅。中聯辦現在就是北京伸進香港的黑手，它分化香港社會，操縱特區政府，從黑幫一直收買到立法會，用生意優惠、政協之類的政治榮耀、權力分享等各種利益拉攏本地的親共勢力，而且放縱太子黨、紅二代進入香港佔領經濟要津，為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戰略鋪墊平臺。

與此同時，中共以十面埋伏之勢對香港的自由傳媒展開封殺。中共現在最大的本錢是擁有收買整個世界的資金，對香港媒體，他們首先採取名利收買的手段，軟化媒體老闆，讓他們自動封口。如果收買不動，就加以恐嚇，乃至暴力對待，最近劉進圖遇刺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香港的媒體自由真正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港人該何去何從呢？當然絕不能相信中共的任何許諾，更不要對中共抱有任何幻想。臺灣學生最近發動的太陽花運動就是港人最好的榜樣。

自由媒體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香港民衆應該利用媒體進行鼓動，發起全民的抗議活動，把類似佔領中環的街頭鬥爭與立法會內的鬥爭結合起來，進一步壯大香港的民主聲勢，最終把北京操縱的特區政府改造成真正由港人普選的政府。